

马克思文化交往理论视域下 新疆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关系探析

洪美云 艾比·沙拉木 赵斌

摘要：文化是人类共享实践活动的成果，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下文化交往理论的基本观点。通过相互交换、占有、融合和利用，不同文化之间互通有无，不断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文化交往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表现出时间性和空间性等特征。研究新疆各民族文化应当以文化交往的历史追溯作为认识的基础和出发点，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形塑发展，始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丰富了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确认知新疆各民族文化，既要立足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史，更要以中华文化作为大背景和大视角；既要着眼于新疆有文字记载的两千多年的历史，更要放眼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史；既要看到新疆各民族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更要看到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对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凝聚。

关键词：马克思交往理论；文化交往；中华文化；新疆各民族文化；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

DOI:10.19683/j.cnki.mzlt.2019.02.001

研究新疆各民族文化，最根本的是要解释清楚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什么，新疆各民族文化从哪里来，新疆各民族文化终将走向何处。说到底就是要在现实领域以历史事实为佐证，穿透历史，解释清楚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深入探讨个中渊源，对于厘清上述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五个认同”，彻底解决历史领域遗留问题，至关重要。本文以马克思交往理论为研究视角，以既存史料及出土文物为依据，论述新疆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在关联与归属关系——从中华文化同新疆各民族文化相互联系的根和魂上，阐明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终“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①

许纪霖先生曾说：“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复线的中国，既有以中原为中心的汉族文明的中国，也有草原、森林和高原少数民族的中国。他们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一部上下五千年中国的历史，

就是一部中原与边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动的历史。”^②中华文化不是单一的中原文化或者汉文化，而是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是由不同类型文化不断融合杂糅、汇聚发展而成。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历史上各民族在长期碰撞、交融，且相互浸润、涵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发展格局，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对源远流长、绵延至今的中华文化的认同，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形塑发展，也始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其繁荣发展丰富了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正确认知新疆各民族文化，既要立足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史，更要以中华文化作为大背景和大视角；既要着眼于新疆有文字记载的两千多年的历史，更要放眼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史；既要看到新疆各民族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更要看到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对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凝聚。唯有如此才

作者简介：洪美云（1981—），女，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行政学院）《实事求是》杂志社副编审；赵斌（1989—），男，《实事求是》杂志社编辑。

通讯作者：艾比·沙拉木（1969—），男，维吾尔族，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行政学院），研究员，民族学博士（乌鲁木齐830002）。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系统工程研究”子项目“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研究”（2016AMZ001）。

①《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研究座谈会在京召开》，《人民日报》2017年9月14日。

②《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7页。

能正确理解新疆各民族文化产生发展、繁荣兴盛的动力源泉与内在机理。

一、基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文化交往——任何形式的交往都包含着文化的因素，渗透着文化的影响

准确界定文化是把握在文化交往中交往什么，而准确理解交往则是把握为什么交往，换言之，就是解决文化交往的动力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交往理论成为我们认识新疆各民族与中原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交往历史的重要钥匙。

马克思将交往问题置于历史维度进行研究，认为基于实践基础上的交往是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人类文明得以产生的基础。人类在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创造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在人们的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创造了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纵向交往是一切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保证。“某一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①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横向交往使得人类避免了为发明生产技术而付出大量的重复劳动，对人类整体文明起到推动作用。

交往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具有重要地位，贯穿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完善和发展的各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交往的论述主要集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部分。马克思肯定了交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的交往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是“现实的个人”之间的交往，是人的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交往的主体涉及人、民族、国家等；交往的类型包括人与自然的交往、人与人的交往，

民族与民族间的交往，最后到世界的交往；交往的内容既有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文化性的。马克思将交往与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社会形态的更替联系起来，指出交往联结着社会、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形成并体现一定的社会关系，标志着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交往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中的个人以及诸如阶级、民族、社会集团、国家等共同体之间在物质、精神上互相约束、互相作用、彼此联系、共同发展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相互关系的统一。

首先，人与自然的交往。人与自然的交往是人生存的根本前提和必要条件。“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②“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关系，体现的是人从自然那里获得生存发展所需要的一切。人与自然的交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商品关系的产生以及社会交往的拓展。其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脱离具体社会历史进程和条件的抽象的孤立的个人，更没有抽象的而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两个人之间的交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既包括物质交往也包括精神文化交往，因此文化交往自然包括在马克思交往理论中。第三，民族和国家间的交往。民族或国家作为文化的创造者，他们之间进行的交往就是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这种文化交往促进了各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

①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②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来,“文化交往”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以人类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过程中所获得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以及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为中介而进行的交往。”^①文化交往的存在和发展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与经济交往、政治交往一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交往通过交换、占有、融合和利用,共享不同主体的实践成果,最终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②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演化过程,文化的产生发展、文明的繁荣进步,都与实践基础上的社会交往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是靠人们之间的积极交往实现的。若不是人们不断地革新交往的方式和手段、不断地拓宽交往的渠道和范围,人类社会的发展“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③各种文化的交流互鉴,对一种文化而言,可以吸纳其他文化的积极成果,摒弃自身文化的糟粕,通过整合创新提升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因此,一种文化的生存、延续和发展的能力同这种文化是否与其他文化进行交往、交流的能力是同一的。文化,说到底就是一种交往的结构与形态,是人类以各种不同方式交往、互动的结果,而不是脱离交往孤立自在发展的。文化交往的意义在于博采众长,超越自身文化局限,文化在社会交往中得到保存和传播,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更加丰富多彩。文化交往的意义可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去理解和把握。从历时性角度而言,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在“真空箱”里面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我者”与“他者”的交流互动中才得以确立自我民族文化的身份地位,而这种文化交往更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从共时性的角度而言,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往,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交流,促成了整个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与绵延不绝。

二、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历史上与中原文化的交往促成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形塑发展、繁荣兴盛

文化交往的历时性,着眼的是交往过程的纵向考察,强调的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交往呈现的规律性的趋势。研究或探讨某一社会历史问题或者现象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必须对历史作较长时间的、充分的历时性考察,因为社会历史规律的实现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从历时性角度看,基于实践基础上的文化交往是促进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与衰退,在多数情况下要视与其他民族有无接触,接触密切,则文化发达;陷入隔绝,则文化渐次衰落。^④各民族基于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必然要相互借鉴、吸纳、兼容彼此的文化。历史上的新疆各民族文化秉承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对来自东西方的各种文化,来自不同族群、种族、民族的文化兼收并蓄,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创造了富有地域特色的灿烂的民族文化。从历史学角度看,解释某种民族文化及其特征和变化时,把它放在历史的过程中去,只有研究历史的全部才能正确解释某民族某历史的历史文化及其变化。寻迹历史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上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是在中华各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中形成的。

新疆地区和祖国内地的联系久远,考古发现早在距今1万年到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新疆地区已经与黄河流域存在文化交流,哈密七角井石器遗址出土的细石器以及浅红色的珊瑚珠等就是有力证明。殷王室墓葬出土的随葬器物有玉器756件,相当一部分是新疆和田出产的籽玉;^⑤新疆天山阿拉沟28号墓地出土的来自中原地区春秋时

①刘明合:《交往与人的发展: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②刘煜昊、张文雅:《马克思文化交往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理论学刊》,2015年第11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④[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

⑤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1页。

期的凤鸟纹刺绣；在阿勒泰地区发掘的石棺墓葬中，出土的铜镜与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出土的中原战国时期的铜镜几乎一样，这些考古资料无可辩驳地说明，新疆与中原地区早已存在的经济文化往来。《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惠文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苏厉由齐国派人送信游说赵王指出，“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说明商至战国经内蒙、宁夏、甘肃就有联接西域的交通通道，玉石之路已经存在，昆山玉可沿此道输入。不仅如此，中原地区传统的丝绣、漆器等，汉代以前在新疆地区已经很常见。还有产自东海、南海的贝类，在罗布淖尔地区的原始社会阶段墓地、哈密五堡、吐鲁番盆地西缘、阿拉沟墓地等均有发现，很好地说明了汉代以前，新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往来已经很频繁，而这正是张骞得以“凿空”西域的重要前提。^①

生产力是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基础，任何民族要维持发展的内在动力，既要依赖民族内部对文明的代际传承，又要通过广泛的族际交往乃至世界性交往，不断实现创新和发展。汉通西域以后，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基于新疆地域原有南北文化圈（北方以游牧文化为主，南方塔里木盆地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影响上，更多的是受到来自东西文化圈的影响，且来自东方的中原文化的影响一直占据主流地位。^②突厥汗国时期（552年—630年，682年—745年），修建的《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碑文同时使用汉文和古突厥文，据《旧唐书》记载，唐朝不仅派人参与了立碑的过程，唐玄宗还亲书悼文，派人“赍玺书入蕃吊祭”。^③史料记载毗伽可汗在位期间，主动与唐朝交好，尊称唐玄宗为父亲，且与唐朝有大规模的边贸互市，经济贸易活动十分频繁。

回纥汗国（公元744—846年）存在的100多年，始终与唐朝保持良好关系，在位的13位可汗有11位接受唐朝册封，且多次与唐朝和亲，唐朝先后有6位公主远嫁回纥，其中有3位（宁国公主、咸安公主、太和公主）是皇室公主。和亲，除了实现政治意图外，也加强了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往融合。《资治通鉴》（卷266）有记载说：“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④这段话就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回纥生活习俗所产生的强烈影响。唐朝平定突厥后（630年击败东突厥和657年击败西突厥），修建了“参天可汗道”，一方面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统治，方便各少数民族前往长安朝拜；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交流，先进的中原文化随着商旅的往来增多，越来越多地被带到了西域，西域文化也逐渐被中原文化所吸纳。唐代都城长安盛行胡风，婚俗礼仪中“下婿”“青庐拜堂”沿袭的都是少数民族习俗。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解体，大量的回鹘人西迁到了高昌地区。而这一地区，历史上曾建立了以汉人为主体的居民的高昌国，历经阚、张、马、麴等诸氏，尤其是麴氏王朝，与唐朝往来密切，实行中原仪礼，是当时西域汉文化的中心。高昌回鹘汗国建立后，吸收当地汉人的先进文化和技术，逐渐改变游牧习俗，开始定居和从事农耕生产。历史上高昌王曾多次主动向北宋赠送方物，而且自称“西州外甥狮子王阿厮兰汗”。考察吐鲁番地区发现的13—14世纪期间的回鹘文契约^⑤发现，当时吐鲁番地区的文字以回鹘文为主，同时又通行汉文，这很好地说明了唐以后到元代，高昌回鹘王国中回鹘文与汉文并用的现象，并且这种文化交融的例子在高昌地区的宗教壁画中也有不少例证，表明内地中原文化已经影响到了广大西域地区，对西域各民族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西域各

①王炳华：《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历史关系考索》，《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②洪美云：《基于文化圈理论的维吾尔传统文化地图》，《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③耿世民：《新疆历史与文化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④[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四册》，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1903页。

⑤朱崇先：《民族古籍文献研究》，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民族文化已经逐渐对中原文化形成了持久的向心力。喀喇汗王朝（公元9世纪—13世纪初）的历代诸汗与中原地区的各朝代始终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福乐智慧》中写道：“要是中国商队砍倒商队的旗子，千万种珍宝从何而来”^①，形象地表述了喀喇汗王朝同中原地区之间存在的密切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福乐智慧》（成书于1069—1070年）产生于喀什一带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已经有一个世纪（喀喇汗王朝960年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②）的背景下，整本诗集不仅有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更有维吾尔先民在漠北草原生活时信仰过的萨满教、祆教、摩尼教等的痕迹，还有不少中原儒家思想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的思想。《福乐智慧》一方面要人民忠君，国君的权力巨大，威严无比，诗人告诫人民说：“君王的权力遍及万民，他眉头一皱会危及生灵。”另一方面他还说：“良法使国运昌盛，人民兴旺，暴政使国祚衰微，天下不宁。”这与中原的儒家思想“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如出一辙。同样，在《突厥语大词典》中也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向心力的影响。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大词典》中将当时的中国分为“上秦”“中秦”“下秦”，所谓的“上秦”就是北宋，“中秦”就是辽朝，“下秦”就是喀什噶尔一带，三位一体才为统一的秦，即桃花石，这种对中国是一个统一体的认识难能可贵，由此可见，大一统思想已经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而内嵌于各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中，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对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强大凝聚力。

蒙元时期，出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曾在西域开辟多处驿站，“凡在属国，皆置驿传，星罗棋布，脉络贯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此又总纲挈维之大机也。”通达边情、布宣号令，使得当时的中央王朝与西域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们通

过驿站“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③大量的西域人口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东迁移，东迁西域人中不少人由于受中华文化熏陶，“学于中夏，慕周公、孔子之道”，效仿华风，习染汉俗，成为典型的中国“士人”^④，他们在积极传播西域文化的同时，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中原汉文化，这种自觉的文化交往既促进了西域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又给中华文化增添异彩。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各民族与中原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更加频繁，清政府积极发展教育，开办学校，在南疆地区还“广置义塾”招收维吾尔族儿童学习汉语言文字，培养了大量的翻译人才，进一步促进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

新疆各民族文化是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复合型地域文化。这种多元性、多维性并不意味着新疆各民族文化是各种外来文化的机械组合，这种多元性是基于一体的多元性。一体意味着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特质从来都是中华文化，而不是别的什么外来文化。日本学者羽田亨作为研究西域史的知名学者，曾说过：“单纯认为回鹘文化是属于西方文化，这是极其肤浅的意见，不足为据。”^⑤传入新疆的各种外来文化，会根据新疆的社会环境，进行相应调整，以便在此扎根，与此同时，它们也会吸取当地各种文化营养，成为新疆各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新疆没有纯粹的外来文化，“历时愈久，各种文化原有的个性就会消失得愈多，而它们与西域文化整体的关系也就愈加紧密。”^⑥伊斯兰教进入新疆之后，深刻影响了新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这种影响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新疆各民族原有文化的基质。因此，由于原有文化基质的不同，新疆近代各民族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虽然都信仰伊斯兰教，但是他们的民

①尤素甫·哈斯哈吉甫著、耿世民等译：《福乐智慧》，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版，第214页。

②马品彦：《新疆宗教知识读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③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④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

⑤[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8—170页。

⑥余太山：《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族文化却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保留着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原色。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麦西热甫；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姑娘追；蒙古族的长调、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叼羊、驯鹰、英雄史诗《玛纳斯》，塔吉克族的鹰舞等都体现了本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①

三、从共时性的角度看——新疆各民族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文化交往的共时性，着眼的是交往过程的横向考察，强调的是同一历史时期，处于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往带来的影响。本文认为，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新疆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往的共时性体现在交往的过程中就是新疆各民族文化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一部分从内部提升和发展了中华文化。与内地少数民族不同的是，处在东西方文明交流重要通道的新疆地区，各民族迁徙往来频繁带来了大量的异质文化因素，这又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使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与其他人类文明一样，体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气质。

从共时性角度看，源远流长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离不开多元异质文化于交往交流过程中的优势借鉴与和谐共生。杂多的各民族文化冲突变化、交流互补，作为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好促成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发生，并通过消长变化保证了中华文化的延续不断。反过来作为宏观大文化的中华文化，对于内部各种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作用。^②在中华民族整体形塑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演绎的时空进程中，可以发现，一方面从起源伊始中华文化即呈现为多元文化代际相承、互动交融的结果。“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是他‘独家制造’；‘转借’实为文化史中的重要因子。”^③中华文化历来迎新纳异、杂糅众俗，飘转豹变，

才得以绵延不绝。另一方面，正是在与多元文化的互动融合中，中华文化的向心力才日益增强，不同族群的归属意识与国家大一统意识逐渐根深蒂固，终致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演进的步伐从未中断，也从未停止。新疆各民族文化不是单纯的存在体，而是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新疆各民族文化，也要看到新疆各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历史性贡献。

新疆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早在先秦时期就同中原地区保持密切联系。^④公元前60年，西汉在新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长期以来，生活在新疆地区的不同种族、民族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汉末，西域坐具胡床（即今马扎）传入，经过很长的时间，汉民族才逐渐改变席地而坐的习惯，从而在礼仪、观念上带来一系列的革命。^⑤凭桌坐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普遍接受并确定下来，这是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一大重要贡献。同样，胡服也改变了汉族社会男子的衣饰，从上衣下裳向上衣下裤转变，深深影响汉民族的衣着服饰，堪称中国古代服饰史上划时代的巨变。

隋唐时期的龟兹乐舞艺术对中华文化影响很大。龟兹乐舞在萌发阶段就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使用的笙箫、弹箏、鼗牢等都是传统的汉族乐器。至隋唐时期，龟兹乐舞发展到了成熟时期，由于唐朝营造的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龟兹乐舞盛行中原。龟兹乐对隋唐音乐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文化生活方面，更体现在对中原王朝的音乐理论、音乐结构编制及内容方面。苏祇婆将“五旦七调”传入长安，促使中原传统音乐体系发生巨大变革。隋朝时，龟兹乐被列为宫中七部乐之一，到唐朝时被定为十部乐之一。唐朝诗人笔下的“洛阳家家学胡乐”（王建《凉州行》）；“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

①仲高：《新疆文化知识读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②向翔：《哲学文化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③[美]罗伯特·路威著、吕叔湘译：《文明与野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页。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人民网，2019年3月19日。

⑤徐杰舜：《汉族风俗史（第一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胡乐。”（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降至周隋，管弦杂曲，多用西凉；鼓舞曲多用龟兹；宴享九部之乐，夷乐至居其七。唐兴，仍而不改。”^①反映的就是西域音乐对内地乐风走向的重要影响。同样，龟兹舞蹈对中原地区影响也很大。《胡旋舞》《狮子舞》《鼓舞》等从龟兹流传内地后，因独特的风格和审美情趣、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广受内地民众喜爱，丰富了中原文化生活。经过不断改造沉淀，今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节庆期间不可缺少的表演内容。西域乐舞的东传，不仅把唐代乐舞艺术推向一个新高潮，而且大大丰富了唐诗宋词元曲的创作源泉。宋词元曲很多都是以西域乐舞作为填词的曲牌，如柘枝词、苏幕遮、兰陵王、琵琶行、破阵子等，不仅为宋词增添了多种风格和形式，也大大拓展了宋词创作的内容。

曹衣出水、凹凸画法、屈铁盘丝是西域画家对我国绘画技法的三大贡献。西域画家曹仲达（公元6世纪）所绘佛像，融合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着力表现人体之美，被称为“曹衣出水”，列为国画技法“十八描”之一，丰富了我国艺术宝库。^②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的凹凸画法，通过晕染使人体富于质感和立体感，大大提高了绘画的表现力和艺术水平；尉迟乙僧所创“屈铁盘丝”，用笔遒劲、粗细一致、极具装饰性。这些都是西域画家对我国画坛的重大贡献。

西域的乐舞和绘画被中原文化所包容，一方面体现了中原汉文化强大的包容和接纳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具有相通性，西域文化无疑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内容，与中原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但在核心观念上和价值取向上仍属于东方文化，属于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华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的分支。正因为如此，西域文化才与中原文化一拍即合，交汇融合，纳入奔腾不息的中华文化的巨流之中。这

一点，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时常被学者所忽视，有必要作出文化基因的准确呈现。

形成于11世纪的《福乐智慧》，是古代维吾尔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作品。《福乐智慧》中有许多关于治理国家、安抚百姓、做人处事的哲理，“要见贤思齐，结交贤良之士，堂堂正正做人，和众人生活在一起”“心与口要忠诚，品行要端庄”“要做好人要行善”等；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人类生而无知，学而知之”“智慧好比黑夜的明灯”等，这些哲理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

蒙元时期，维吾尔族先民畏兀儿人大量进入元朝中央或者各级地方政府中为官做事，较为有名的高昌亦都护、孟速思、小云石脱忽怜、哈刺亦哈赤北鲁、塔塔统阿等29家之多^③，其中先后有18位畏兀儿人供职于中书省（宰相府）。^④当时西域地区的葡萄酒和名叫“纳失失”的织锦深受元朝最高统治者的喜爱，同时元朝统治者还接受畏兀儿人的文字，不仅加速了元朝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还对此后以蒙古文为基础创造的满族、锡伯族文字也影响巨大。蒙古人第一部史学名著《蒙古秘史》也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写就。元修《辽史》《宋史》的纂修官多用畏兀儿人。贯云石（阿里海牙之孙）是元代最著名的散曲作家之一。安藏是元朝著名的翻译家，曾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精通儒释典籍，将《资治通鉴》《尚书》《本草》等翻译成回鹘文，贡献很大。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涉及农作物种植、栽培的方方面面^⑤，不仅对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进行了总结，也囊括了广大西域地区各民族的生产经验，是我国农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为农学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因环境多样性而呈现丰富多元形态。揆诸历史，秦汉以后，中华大一统的思想逐渐形成，中原地区文化持续与周边地区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经唐宋元明清历代发展，

①王嵘：《西域文化的回声》，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②柳用能：《新疆古代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③《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元明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209页。

④刘改宁：《元代色目人宰相群体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75页。

⑤高永久：《四海之内——民族的形成与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8—190页。

各民族文化深度融合、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艺术、哈萨克族阿依特斯艺术、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等，既是各民族的文化瑰宝，更是中华文化的璀璨明珠。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得中华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彼此借鉴，是中华文化不断丰富发展的强大动力。^①中华文化并非单一民族创造的，而是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新疆各民族文化是生活在新疆地区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更是新疆各民族在与中原地区交往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华文化的发展至少说明了三点：一是我国各个民族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二是文化的多样性是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活力源泉，三是开放交往融合是文化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

四、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发展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新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与保护工作，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加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各民族间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各级各类文化机构、队伍、设施建设逐步建立并逐渐形成规模，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有了长足发展，濒临灭绝的民族文化遗产得到了及时抢救性挖掘，各民族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反映时代巨变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文艺作品广为流传，“歌舞之乡”的民族文化艺术走出新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尤其是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党和政府支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政策引导和推动下，新疆各民族文化进入史无前例的繁荣发展时期。^②

1. 从制度上保证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发展进步。交往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保证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格局中的发展进步的重要前提是促进新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这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我国真正实现了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改革开放后，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联系日趋紧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共同性和依赖性越来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已经成为各族人民群众的日常行为和自觉行动。首先，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制度支撑。新疆是全国5个自治区中唯一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自治单位俱全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③目前，新疆的13个主要民族，除汉族外，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等7个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建立了民族自治地方，乌孜别克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等3个少数民族建立了民族乡。各族人民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光辉照耀下，当家作主。新疆的各民族之间交往空前广泛，交流空前深入，交融空前深化。其次，加快新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大力帮助新疆发展经济社会事业，推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19省市对口援疆工作，支持新疆地区加快发展，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共享了改革发展成果，夯实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物质基础。现在，新疆与内地、新疆各区域、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人口流动愈来愈频繁，为各民族交往创造了更多机会，带动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发展。最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开展“三个离不开”，增强“四个意识”“五个认同”，积极开展民族团结共建活动，创新民族团结活动载体，新疆各民族在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下，相互影响，吸收融合，巩固了民族交往交流的思想基础，构筑新疆人民

①李晚霞、木拉提·黑尼亚提：《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6日。

②艾比布拉·阿布都沙拉木：《辉煌60年·新疆繁荣发展的文化事业》，《实事求是》，2015年第5期。

③曾和平：《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共有精神家园。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不仅是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进行倡导、推动的结果，也是随着各民族间社会交往的日益增多，利益逐渐趋向一致，自然发展的结果。此外，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畅通渠道。国家通用语言在新疆的推广，对于个体而言，意味着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对于新疆各民族而言，则是在中华文明的深厚滋养中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从法治上保障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发展进步。首先，立法先行，民族文化保护立法工作有序开展，为新疆民族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法治保障。新疆的历史文化遗产众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种族、不同族群、不同民族的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璀璨的文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物古迹。上至石器时代，下至近代，这些历史文物既是新疆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的体现，更是新疆和祖国不可分割血脉相融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后，新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上位法的法律精神创造性地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等地方法律规范，在法治化的轨道上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了整体性的、全面性的保护。其次，大力推进文物古籍、古迹保护修缮与整理工作。完成了濒于失传的《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的翻译出版工作，哈萨克族的阿依特斯艺术、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的搜集整理工作取得重大成就。截至2017年，完成古籍整理普查共计14980种^①，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众多领域。同时，加大对高昌故城遗址、北庭故城遗址、惠远新老古城遗址等一大批文物古迹的修缮保护，3000余件珍贵文物被抢救性保护修复。

3. 不断推动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文化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历史进程，发生着或

快或慢的、时显时隐的、这样那样的变化，有时候是文化的内在特质发生变化，有时候是外在表现方式发生变化。总之，变化是文化的恒常存在方式，一成不变的文化反倒是不存在的。^②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首先，加大对新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名片和标识，党和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持续推进“中华文脉——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记录工程”，仅2018年国家财政就拨付专项资金1898万元支持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完成23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创建了维吾尔族乐器、地毯和艾德莱斯绸织造3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国家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命名91个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新疆入选国家级、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的项目分别为83项、294项，国家级、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为112位、403位。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新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其次，扎实推进新疆各民族文化事业的创新性发展。建设更加完备的文化服务体系，为提高各民族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着力建设各类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截至2017年，全疆各地共有公共图书馆112个，博物馆和纪念馆173个、美术馆57个、文化馆119个^③，形成了区地县乡村五级公共文化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体系进一步完善，极大地丰富了各族百姓的文化生活。文艺创作佳作纷呈、成果丰硕。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代表性、高质量的优秀成果，极大满足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我们新疆好地方》等经典歌曲传唱大江南北，《冰山上的来客》《库尔班大叔上北（下转第24页）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文化保护与发展（白皮书）》，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

②朝戈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光明日报》，2018年3月21日。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文化保护与发展（白皮书）》，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8页。

义立场,采取的是本质主义的文化观,而文化互动教育理念更加侧重文化的普适性,关注差异性与共同性,强调文化互动观。当代跨文化心理学的大量调研也表明,基础性的心理过程对于全人类的所有成员来说是共同的,是特定文化影响了其所属个体心理特征的实际发展和具体表现。也就是说,不同文化对这些共同的基础性过程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文化中个体行为有相似性(即文化普同性),也有差异性(文化特殊性)。^①教师必须拥有特定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从而帮助学生理解知识的建构方式并对社会中不同族群关系做出回应,对不同民族文化历史有深刻的了解,这也对

师资培养培训提出了挑战。

总之,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重新思考学校的管理制度、教师的文化互动教育理念、课程与教学、双语教学模式、不同文化互动态度等,还要考察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族际互动历史、居住格局、人口规模等,以充分发挥直接的、间接的、隐性课程意义上的民族团结教育的优势,提升民族团结教育的效果,促进不同民族师生的文化交往交融,实现中华文化的认同,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共有精神家园。

(责编 张小林)

①常永才、杜双萍、程冬冬:《文化互动胜任力:“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人才培养新课题》,《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7年第5期。

(上接第11页)

京》等优秀电影家喻户晓,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进入了新的繁荣发展时期。

结语

关于新疆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的研究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众说纷纭,缺乏共识。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历史上西域文化历经几次大的文化转型,“西域地区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地理造成的文化断层、文化整合的困难以及文化传统的无法一以贯之的客观现实,使我们在概括西域文化特质时显得犹豫不决。”^①二是由于分裂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干扰和破坏,致使部分学者在专业研究上缺乏正确的政治导向。长期以来,在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研究上,存在强调特殊性而忽略普遍性,强调地域性而忽略整体性,强调西方外来文化影响而忽略与中华文化的母体关联等错误倾向,这些问题,给新疆意识形

态领域造成比较恶劣的影响,对新疆地区“五个认同”的提升,对新疆各民族人民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造成了严重干扰。从本质上讲,新疆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问题,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正确看待新疆各民族文化问题事关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安全问题,事关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实现,事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迫切而紧要。站在什么样的视野下看待新疆各民族文化决定了看待新疆各民族文化的格局,有大视野才能有大格局,只有站在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视野下,才能看到新疆各民族文化产生发展、繁荣兴盛的动力源泉与内在机理,才能看到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日益繁荣与昌盛。只有把中华文化始终作为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才能促进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责编 觉理)

①尚衍斌:《西域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